

Marxism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 主编

生态地批判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John Bellamy Foster | 郭剑仁 著

人民出版社

Marxism |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 主编

生态地批判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John Bellamy Foster | 郭剑仁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郭剑仁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王雨辰主编)

ISBN 978-7-01-006664-6

I. 福… II. 郭… III.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

IV. A811.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577 号

生态地批判

SHENGTAI DI PIPAN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郭剑仁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2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664-6 定价:2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总序)

王雨辰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如果从徐崇温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算起,至今也不过25年时间。然而,这25年时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认识不断走向深入的时期。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理论视阈的不断拓展,使得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其一是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使得他们对于如何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分歧乃至激烈的争论。其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间出现了双向互动的格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更加深刻地研究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其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群体不断扩大,研究范围逐

渐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回顾和分析上述三个特点形成的过程和所包含的信息，对于我们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我国学术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上述三个特点，实际上也标识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按照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徐崇温先生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非是出于理论自觉，而“从一开始就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来的：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后不久，找学术情报、哲学等研究所的领导前去领受任务时说，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①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关键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存在着双重的错位。从社会历史背景看，虽然经过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但总的说来我国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起步阶段，加上“左”的教条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代性的批判等话语系统一时还很难为我国学术界所理解；从理论背景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正统，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反对这种解读模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看做是打了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即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① 徐崇温：《徐崇温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引进和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性著作和代表性观点,为日后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一些准备性工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1986年以后,客观上要求正确认识和评价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哲学理念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批判地反思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体系的理论得失,体现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更深入的探索和理解。理论视角的变化,使人们对于如何理解、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争论热潮,争论的目的就是要摆脱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中建构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图景。这场争论不仅使学术界熟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深化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且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影响,我国著名学者张一兵先生曾经指出:“最初接触这一新的理论领域,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其时是在徐崇温先生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中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思想流派的。在当时的直觉中,有一种深深的震惊:研究马克思哲学还能这样出彩。”^①而为了获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①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2页。

批判权,迫使他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即“回到马克思”^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主体性问题”、“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人学”以及“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中,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② 无论是否存在这种解读模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

进入到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具体体现在:一是研究主题进一步扩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生态批判等,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共鸣,使得学术界从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一步扩展到研究其社会批判理论和现代性理论。二是研究方式从过去的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研究和追踪研究,学术界不仅出版多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同时也出版了多部研究专题性问题、研究代表人物的著作。在追踪研究方面,分析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阈中,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开始关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

① 张一兵:《深度解读: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1999 年第 8 期。

②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三章。

哲学思潮”等，并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统称这些在后现代思潮中理解、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流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从而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

回顾我国学术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程，给我们比较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是：应当立足于怎样的哲学方法论来认识和评价不同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如果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模式，以此为裁判权，那么就势必不可能客观地看待和认识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是否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回答和解决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这事实上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会在实践过程中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流派发展是其必然结局。而这一切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本性使然。跳出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深入了解西方社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

但是，也需要指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也暗含问题。其一是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并由此引发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它到底是否反对列宁主义。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的确和恩格斯、列

宁是有差别的,但是“有差别”是否就是反对“列宁主义”,这是一个需要细致研究的问题。部分学者为了避免研究之前预先设定主观框架,于是用一个比较中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地域性概念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有特殊内涵的,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产生,以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目的的一股思潮。只是后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教条主义的压制之下,才不得不在西方共产党外发展。不论其理论是否正确,但是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是对国外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各种理论思潮的总称。这其中既有同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流派,也有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还存在着仅仅只是借鉴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与马克思保持名义联系的后现代思想家。显然,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思潮在价值和意义上根本无法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其二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是并不能说已经很深刻。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性问题研究、人物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事实上,学术界关注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群体在不断缩小,更多的是引进和评介20世纪后期出现的各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这种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是必要的。但是因此而冷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是令人担心的,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是笔者所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的重要研究方向。自1981年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以来,就一直开设“西方

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和研究方向。2006年我们又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研究方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近年来我们先后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引进学术带头人和年轻博士，形成了学术结构和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团队，并把研究领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为主体，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学科点，被纳入学校“211工程”建设项目。这套丛书就是我校“211工程”建设项目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中的著作或者是我们学术团队部分教师的各级各类研究课题，或者他们的博士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持续不断的出版和若干年的努力，不仅进一步搞好我们的学科建设，形成我们的学科特色，而且为推进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序

何 萍

郭剑仁的《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经过修改,即将付梓。他请我为此书作一短序。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想借此机会,以他这本书写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谈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郭剑仁是2001年考上博士研究生的。在此之前,他在本科阶段学的是生物,在硕士生阶段师从张巨青先生专攻逻辑学、科学哲学。进入博士研究生学习后,他立志把他先前学习的知识结合起来,开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他的这一志向,我是很支持的。但是,在当时,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可谓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有两点:一是资料严重不足。国内虽然有了许多生态学的资料,但大都是一些诸如绿色运动方面的经验资料,真正有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的资料却很少。他当时所搜集到的资料根本不足以支持理论研究。二是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国内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并没有对

它的理论形态作全面的了解和透彻的研究,甚至连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都还没有厘清。正是这两大困难使郭剑仁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理论研究意识,决定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定位于哲学理论的层面上。但是,确立理路并不意味着就进入了研究。在入学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郭剑仁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几乎是处于停顿阶段。资料搜集了不少,有用的不多,理论研究无从着手。这种状况直到我从美国回来,才有了实质性的改变。2002年年初,我去哈佛大学哲学系做高级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与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福斯特建立了学术联系,并且在那一年的社会主义学者大会上见了面。当时,我们就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行了交谈。福斯特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并且说,若要介绍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必须介绍奥康纳的思想,因为奥康纳与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路是不同的,并且是直接对立的。谈话完之后,他还热情地带我去他主持的每月评论出版社的购书点,允许我随意地选择他们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赠送给我,凡购书点没有的,他都以邮寄的方式赠送给我,同时,也每年赠送我们学科点《每月评论》杂志。这样,我不仅从他那里知晓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获得了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资料。同时,我也按照他的指引,参加了奥康纳主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基本上把握了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基本走向。回国后,我就将我所得到的资料和理论研究状况告诉了郭剑仁,还帮助他同福斯特建立了通信联系。福斯特寄给他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料,

还直接指导了他的论文写作。有了这些帮助,郭剑仁很快就了解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确定了论文的选题。论文完成后,他还将论文的主体部分翻译成英文,送给福斯特,请福斯特指教。福斯特充分肯定了他的论文并认为,他对自己的思想乃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握基本上是正确的。我想,福斯特的这一评价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

从我自己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到指导郭剑仁的博士生论文,我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反思。

其一,有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个由经验而理论的过程:70—8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与绿色运动相联系,在经验的层面上发展,而在理论上,主要采用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而到了90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始突破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为了建立自己的哲学范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返回到马克思的著作,重新解释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这其中最突出的有本·阿格尔和福斯特。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通过对资本论的结构解析,一方面在理论构架上阐发了从马克思到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再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内容上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是当代唯物主义哲学的主体内容;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从哲学形上转型的视角,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在这个问题上,福斯特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对马克思博

士论文的解读,发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渊源。他的观点是,马克思通过评价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提出了非决定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从而奠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二是融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于自然本体论和认识论为一体,建立起人和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新的哲学本体论。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他建构起了自己的哲学问题和研究范式。透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从联系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两点上继承了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一是坚持了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历史走向。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反对自然本体论,坚持在人的文化、历史层面上建构意识形态理论。为了论证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首要性,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否定外部自然的哲学意义,竭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删除非人化的自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这一思想运用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说明,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历史联系,以此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非决定论。这一思路,在奥康纳那里,是以论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技术和文化价值的有机统一性而实现的,在福斯特那里,则是以论证自然异化而实现的。二是紧密联系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苏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抽象为一般原理、一般方法,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理论,它的每一个原理范畴、每一个方法,都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呈现出它的

意义。这就是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的
总体性原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这一思想运用于考察资本
主义的消费社会,指出,生态问题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为了
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长而鼓吹消费主义的结果。因为,消费
主义必然刺激社会的过度消费、滥用资源,其结果,一方面是
人的文化的异化,另一方面是自然的异化。由此可见,生态危
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人类只有根除了资本主义制度,
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就把生态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而纳入到历史
唯物主义的课题之中。从区别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说明
外部自然的异化,扬弃了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封闭
的历史唯物主义模式。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人道
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以实践否定外部自然存在的同时,也以实
践阻塞了人对外部自然的开放,把人的活动封闭于社会历史
领域。这一缺陷注定他们的理论只能说明人与社会的异化现
象,而不能作为生态学的理论,去说明自然的异化现象。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对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
一缺陷的克服。由此可见,我们要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
了解它与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态上的差别,就必须研究
它与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其二,有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问题。在一般人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只是对人与自然关
系的思考。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内容,除此之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研究当今世界的公
平、正义等社会生态问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今世

界,全球社会政治的生态问题比自然生态问题更为严重、更为突出。因此,不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多么大的理论分歧,其理论的内容无不论及诸如女权主义、民主运动和民权运动等当代新社会运动的成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正是在不断地汲取新社会运动的这些成果中丰富自己的理论,并由此而成为当代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奥康纳把这种理论称为生态学社会主义,并比较了它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我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奥康纳分析生态学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最重要的意义不在它的内容,而在它的形式。这种形式首先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关联:新社会运动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基础,支持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公平、正义的观点,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姿态成为新社会运动的指导,体现了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其次是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和结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新社会运动的内容,或者说,是以新社会运动的内容更新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更新的基本点,就是以技术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扬弃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结构采取单一技术向度或单一文化向度的说明方式。由于这种更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在经验、历史理论和本体论三个层面上更新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在经验层面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层面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文化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构取代了以往历史唯物主义意在说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采用的单

一的技术性,或单一的文化性的结构;在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自然、实践与人的认识的相互作用关系的说明扬弃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然与实践分离为两个哲学世界的片面性,构建了新的哲学范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的更新,而在经验和理论的张力中建构起了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再次是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传统社会主义为时代的任务所决定,带有很大的民族性特征,而新社会运动以当代的国际背景为基础,具有国际性特征。与之相联系,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20世纪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以传统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的经验基础,在哲学形态上,无不概括各自的民族内容,无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殊性,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以新社会运动为基础。新社会运动的国际性、普遍性的特征决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质。这种哲学性质的变化表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突破了先前的单一的民族性特征,进入了国际性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像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强调单一的国际性,亦不像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强调单一的民族性,而是以文化的一般和个别为契机构造起来的国际普遍性与民族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体。以上三个方面的意义表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形态,它的全部内容和性质都植根于新社会运动之中,因此,若不了解新社会运动的内容,不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之间的深厚联系,我们就不可能全面